



张晓虹 著

古都与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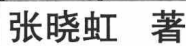
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

葛剑雄

丛书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图上的中国历史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都与中国/张晓虹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2

(地图上的中国历史/葛剑雄主编)

ISBN 978-7-214-05037-3

I. 古… II. 张… III. 城市史—中国 IV. 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3104 号

这套书名为《地图上的中国历史》，包括《疆域与政区》、《古都与城市》、《交流与交通》、《民族大迁徙》四种，顾名思义，是以地图为纲，讲述中国历史的某一方面。

前贤总结的学习历史的方法，强调要抓住几个 W，其中一个就是 Where(哪里)。因为任何历史事实，无论是人物、制度还是事件，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与一定的空间范围联系起来的，都发生或影响于地球表层的某一个点、线、面。正如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所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空间因素对历史的作用如此重要，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亲自考察全部空间。即使能够身临其境，也未必能发现特定空间的概貌和特征，所以地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在测绘技术还不发达、绘制地图相当困难的古代，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地图的运用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形成“左图右史”的传统。地方志的前身“图经”就是有图有经，其中的图主要是地图。其他一些史籍也往往附有地图，并形成专门的读史地图集和历史地图集。早在公元 3 世纪，贾耽就曾按《左传》等书的内容编成《春秋盟会图》。1905 年问世的杨守敬所编《水经注图》，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是历史专题地图的集大成之作。公元 1137 年刻石的《禹迹图》是贾耽《海内华夷图》的简略版，并且立于州学之内，显然是用于教学。

随着卫星遥感、信息技术和网络的进步，人们往往以为有了 GPS(全球定位系统)和 GOOGLE MAP(谷歌地图)等精确的遥感图像，地图

的作用已经不如以前,甚至可以被取代了,这是一种误解。谷歌地图实际上不是地图,而只是遥感图像,所显示的只是地球表层的实际状况。尽管这些图像精确逼真至极,每个点都可以显示具体的经度和纬度,却无法代替能够综合地、抽象地显示特定地理要素的地图。因此,在较大范围的空间内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时,还是需要该区域的普通地图或专题地图,或者相应的电子地图。

何况了解历史所需要的地图并非今天的地图,而是相关时代的地图即历史地图。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那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或多或少会与今天不同。即使自然地理状况变化不大,人文地理要素也必定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有些要素甚至已完全消失,有些要素则当初根本还不存在。这些历史地图必须由研究者按照历史事实和相关的地理状况专门绘制。

甘肃舟曲地区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后,电视台在发布这条消息时就配了一幅地图,使观众知道了它在中国和甘肃省内的位置,也明白了它与甘肃省会兰州以及定西、四川省、白龙江等地名的关系,否则,不熟悉地理的观众往往无法理解有关新闻的意义。要理解历史,更需要配上相应的地图,否则,即使有注释,非专业的读者也不可能形成正确的空间概念,而无法复原出很多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地名或已经改变了的地形地貌,有不少历史现象就变得难以理解。

例如,中学语文课本中曾选了唐朝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根据作者的描述,他是在轮台目送武判官进天山的。今天的轮台离天山数百公里,无论如何看不到天山。但是,如果了解唐朝的轮台是在今乌鲁木齐附近,这个疑问就不存在了。又如,北宋覆灭后,赵构在南京即位,又在金兵的追逼下到达扬州,再渡过长江。如果以为这个南京就是今天的南京,就无法理解当时的军事形势:既然金兵是从北向南进军的,赵构为什么还要从南京北上扬州?实际上,北宋时的南京是今天河南商丘,由此南下,沿着当时的汴渠到达扬州,这样的路线顺理成章。如果将这些内容用地图来显示,标上当时的地名,岂不一目了然?

更复杂的历史现象和研究成果也能通过地图而明确起来。例如,

先师曾详细收集了今河北、山东相邻地区已经发现的考古发现和文化遗址,将它们一一标在地图上,发现其间存在着一片扇形的空白,这一范围内没有公元前4世纪之前的遗址,而这一带正是当时黄河河道的下游。结合周围的地形地貌,先师确定,在黄河两岸筑堤前,河道不受约束,曾经在这一范围内反复摆动,以致人类无法定居。这些情况找不到文献记载,也无法根据今天的地形地貌作出判断,地图却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手段。

作为一种新的尝试,作者们不是简单地将地图当做插图,而是通过一系列地图提纲挈领,作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力求更完整、准确地讲述历史。因此,我们选了四个与地图关系比较密切的专题——疆域和政区、古都与城市、交流与交通、民族大迁徙,每个专题都涉及大量古地名和其他地理要素,离开了历史地图,即使增加再多的文字,也未必能帮助读者确立准确的地理坐标,形成完整的空间概念。如果读者鉴定认为行之有效,我们还将扩展到其他专题,形成系列丛书。

承蒙作者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推我为主编,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必须说明我做的工作:与作者、编辑讨论确定了本书的主题和各个专题,对全书的体例,特别是地图的运用提出了要求,对各书的内容和结构提出一些意见,并写了这篇序。

葛剑雄

2010年9月1日

按照中国传统,中华文明史起自三皇五帝时期,号称“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或可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中华共同体形成之初“王天下”的代表人物。^①但在传说中,神农曾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②的事件发生。而另一位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据说也曾“为五城十二楼。”^③而大禹的父亲鲧更有“鲧做城郭”^④之说流传下来。这些记载或传说其实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在中华共同体形成初期,城就相伴而生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传说都被当代的考古发现间接证实。在目前已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属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城址,长江中游地区属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诸城址,长江上游地区属宝墩文化时期的诸城址以及河套地区属老虎山文化时期的诸石城址等,都是属于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的城址。

在人类社会早期,城与国往往合为一体,一城大多就是一国,一国更多的只有一城。这些国或城分散在神州各地,规模、形式并不见得都相同,但相互之间却总有些联系,或争战、或交易,就在这分分合合、纠结不清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中华共同体,

① 参见吕思勉:《先秦史》第6、7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② 《汉书·食货志上》。

③ 《汉书·郊祀志下》。

④ 《世本·作篇》。

城也就成为这一民族共同体重要的物化标志。^①

到了夏商时期,中华共同体已经稳步发展,并在中心地带的河洛地区首先形成了最早的都城。被认为是夏代都城遗址的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郑州,而商的早期都城亳,位于今河南偃师,而后再迁到今河南郑州,史称隰,再迁至今河南安阳洹水畔的相城。这些城池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都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除了这些位于黄河流域的大型都城外,长江流域这一时期也出现不少的城址,甚至这些城址的规模与出土的文物并不逊色于河洛地区的都城,其中最典型的是蜀汉三星堆遗址。而湖北黄陂的盘龙城,规模与形制也与三星堆差相仿佛。

夏商之后的西周,在武王伐纣,尤其是在周公平叛三监之乱后,封建诸侯,以屏藩周。各诸侯就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建王城。由于周王室推崇“大聚”,所以,各国诸侯纷纷兴筑大城,并延续了外郭内城的制度。再到后来,狼烟四起的战国时代,更是进入了修城的高潮时期,在《左传》中我们就可以常常看到“城”某地的记载。这里的“城”是动词,也就是修筑城墙、兴建城市之意。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第一个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改西周实行的分土而治的封建制为分民而治的郡县制。秦虽二世而亡,但他的制度却为西汉政权所继承。汉兴之初,高祖刘邦即“令天下县、邑城。”^②据说,从此兴起了一波筑城的风潮,而这也为考古所证实:西至后来为武帝所征服的河西地区,东到沿海,南到岭南,北抵长城,到处都有汉代古城的发现。不过,除了皇都长安,以及西周延续下来的诸侯国都外,大多数郡县邑城规模狭小,与后世的通都大邑相比,不足为道。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即便是通都大邑,也多没有规划,基本上是因

① 曲英杰:《古代城市》,4—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② 《汉书·高帝纪》。

地制宜,因陋就简。甚至连国都长安,也不过是一个宫殿密集、官署杂错其间的居住区域,城墙是在多年后才修建起来的。至于所谓的“南象南斗,北象北斗”的斗城之形,其实不过是一个迫不得已的结果,并没有后世所描述得天花乱坠的理念蕴含其中。

但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从此成为统治阶层主导意识形态,都城的实体建设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尽管两汉都还来不及将儒家的礼制完全贯彻到都城规划与都城建设中,但这一理念却从此深入人心,因此无论是六朝建康,还是曹魏邺都,都力图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儒家礼制,把国家意识形态具体化。不过,这一时期真正把儒家礼制运用到都城建设中的巅峰之作却是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他们所营建的都城洛阳堪称当时最能体现《周礼·考工记》原则的作品,并显然启发了后来宇文恺营建隋都大兴城的思路。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都长安及东都洛阳城市建筑宏伟壮阔。其规划整齐的坊市,巍峨壮丽的宫城,成为当时周边国家,如日本、渤海国和南诏国争相模仿的典范。事实上,唐代的长安确实是将儒家礼制应用到都城规划中的又一个经典之作,它直接承袭了北魏洛阳的规划思想与城市布局理念,并且对后世的都城规划影响深远,尤其是元大都的修建隐约透露出唐长安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国都之外的城市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与益州(今成都)“号为天下繁侈”,其城市规模与经济生活都达到了十分可观的水平。事实上,这也是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反映出经济活动已开始在城市发展居于重要位置。

宋、辽、金、元,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从都城规划上,出现了元大都这样最完美地实现了《周礼·考工记》儒

家礼制的都城；与此同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批地方城市的出现，其规模与地位可与都城分庭抗礼，成为从唐代到明清时期的重要转折时期。

被西方汉学家称为“帝国晚期”的明清时期，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城市规划方面虽没有创新，但地方城市的兴起，使得城市在全国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市镇经济的发展，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特征。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因列强的进入，沿海、沿江地区开埠城市的出现，则完全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旧有格局与景观，成为学者所称的“镶嵌在旧式长袍的新式花边”。

引 言	1
-----------	---

考古与传说时代

第一章 城·市——早期城市的起源	2
1. 致天下之民	6
2. 造郭以守民	9
3. 聚天下之货	12

第二章 都·邑——夏商周都城	15
1. 夏都二里头遗址	15
2. 盘庚迁殷与殷墟的发现	20
3. 武王伐纣与丰镐二京的建立	23
4. 营建成周	29

古都篇

第三章 京·师——国都的确立与迁移	34
1. 定都之议	34
2. 四塞之地长安与四方之中洛阳	46
3. 天下之枢开封	51

4. 南北往复	54
第四章 都·京——首都与陪都	65
1. 东西二京	65
2. 五京制度	67
3. 京师拱卫	77
第五章 城·郭——都城形态的演变	85
1. 匠人营国	85
2. 居主奥区	89
3. 承天之序	101
4. 万世之邦	108
第六章 里·坊——都城社会的发展	138
1. 闾里闾閭	138
2. 坊肆谨严	141
3. 绣旆相招	150
4. 勾栏瓦舍	167
城市篇	
第七章 市·镇——城市与经济	172
1. 宋代草市	174
2. 明清市镇	183
第八章 水·城——城市与交通	199
1. 水陆会通	199
2. 运河城市	212

3. 江海通津	221
第九章 中·外——城市与中外交流	226
1. 丝路城市	226
2. 开埠城市	236

考古与传说时代

城·市——早期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看法。

具体到中国城市出现的时代,目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龙山文化,就已出现了城市,因为考古上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古城,城就是城市的雏形,或早期的城市;^①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之后,城市是由市(场)直接发展而形成的,市是城市的前身;^②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最早修筑的城,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村落,具有真正规模的城市出现于西周时期,春秋后期直到战国时才得到了广泛的发展。^③

其实,这三种意见相左的观点,真正的区别在于对城市定义不同。所以,我们要想确定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何时,就必须明确城市到底是什么。

一般来讲,城市是与村落或田园聚落对应的概念。《辞海》中对城市的定义是:在狭小的地域上集中大量非第一产业人口,其居民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城市还是周围地区的

① 杜瑜:《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②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8—1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③ 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2期。

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中心。德国早期人文地理学大师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曾指出:“城市是人类及其居住地永续的密集地区,而且位于主要交通道路的中心。”

显然,《辞海》中的定义强调的是城市的经济功能与经济形式,而拉采尔的定义则不那么严密,认为只要是人类集中居住的区域,即可认为是城市。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考量一下上述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城墙围合的区域,就是城市。可见,与拉采尔的观点不谋而合;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城市的经济功能,即商品交易功能,这一点倒是与《辞海》中的意见一致。第三种观点其实与第二种观点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它把城市形成的时间推迟到了城市已发展较为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而这时城墙与市场已合二为一,才算是中国城市真正出现。

那么,我们再用中国古代文献与城址考古资料,分别考察中国城市的形成历史。

早期的人类,由于征伐不断,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区修筑城墙的特点。早期典籍《黄帝内传》、《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都有记载,如“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或“鲧作城郭”等。而从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我国筑城的历史非常悠久,大约是在原始社会中后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就开始有城址发现。当然,由于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较为先进,故史前时期城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约有40余座。^①不过这时的城只是防御工程,正如《墨子·七患》中说的:“城者,所以自守也。”显然不具备后期城市的两大要素或形态——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

^① 曲英杰:《古代城市》,1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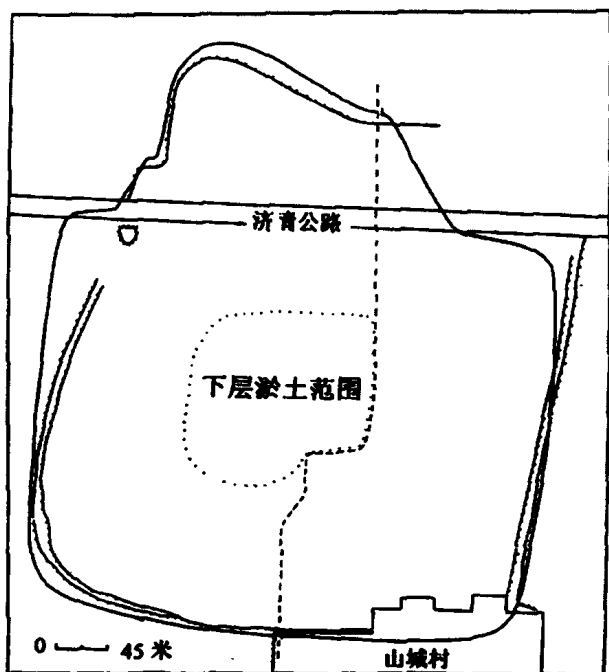


图 1-1 山东章丘城子崖史前期城址平面示意图①

而后期城市的主要要素——商品交易，也就是市场，开始时和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世本·作篇》中有颛顼时“祝融作市”。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注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是说早期的市场，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大多数情况是人们就近在每天汲水的井边进行交易，并没有专门的空间，最多也是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相近，与城的关系不大。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市不具备后期城市的基本形态，并不是城市的前身，因此把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认定在原始社会后期，多少有些勉强：当时虽然有城、有市，但前者为了“盛民”，后者为了“买卖”，互不相干。

但是，即便是按照上述《辞海》中城市的严格定义，中国城市

① 曲英杰：《古代城市》，18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